

观念秩序给定下的百年经济史辨析

■ 苏小和

我大概讲三个内容,第一是观念秩序给定是什么意思,二是百年经济史的辨析,就是在书里面找了几个案例,第三就是观念秩序与百年经济史辨析的关系。

第一,问题的提出。百年经济史也算是历史学,我个人观点,从《史记》开始,中国人觉得看历史就是寻找历史真相,记录真相,这是历史学比较高的境界。大家觉得只要了解真相,人们就会恍然大悟。但是人是观念的载体,每个人都具有挥之不去的主观偏好特征,因此在主观观念层面的复杂性远远大于事实真相的复杂性。我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真相的重要性,而是相比观念的重要性,历史对人性的影响力是比较微弱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是一个人愿意直面真相,分析真相,这个人在接触真相之前已经建构起直面真相、反思真相的观念新秩序,观念的影响才是本质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才是本质的教育,这是判断一个时代教育体系是否深刻的教育标准,更是一个写作者是否具有本质写作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第二,讲一下观念的给定,观念的先验秩序如何影响我们。首先就是康德,PPT上面放了一个康德观念的很著名的判断,观念的发现是第二次哥白尼革命。迄今为止我们假定我们所有知识都必须以这个为准绳,但是按照这个假定,试图通过已有概念先天的构成有关对象的东西以扩展我们知识的努力都失败了。因此我们不妨尝试一下,假定必须按照知识构成,我们在形而上学中的任务是否会更好进展呢?这一假定或许与所要求的可能性,即关于对象先天知识可能性相一致。因此他认为和哥白尼的发现是一致的,哥白尼假定全部解释都围绕观察者旋转的时候,他对天体运动规律都顺利进行,于是他试图让观察者旋转而星体静止,看看是否能获得新的发现。怎样辨析康德的表述呢?一个学者如果立足于他已有的观念秩序解析康德的观念秩序,他不仅无法理解康德的观念秩序,甚至误读,甚至否定康德观念秩序的表述。国内有两个康德研究的人,一个是复旦大学的于教授,还有一个是邓教授,于教授不太接受康德的观点,所以把重点放在辨析哥白尼革命与康德的所谓观念革命之间差异上。但是邓教授接受了康德观念秩序的表述,开始总结出一个中文的表述,就是不是观念施于事,是事物施于观念。我对康德的观念秩序的表述分三个角度思考, **第一,我认为,也是认识性的终点,也是方法。**笛卡尔的话就是我思故我在,个体最重要的意义是思想。另外一个哲学家也是 17 世纪的,他的一段很有名的话,就是真理是主观的。真理概念的判断必须包括对客观性的反提表述,讲了这个意思。按照康德的表述,真理是一套整体的、无所不在的观念系统,这个观念系统一方面作为先验秩序,一方面作为个体主义的绝对价值存在。

康德另外一个观念的表述就是二律背反,意思是两个命题单相度排列的时候,两个命题都是对的,但是两个命题合成一个大的命题,大的命题隐含了悖论和内在冲突。因此康德证明,个人或者个体理性能力和观念秩序需要超出作为个体现象的秩序的范畴,才能赋予客体新的知识意义和观念秩序。按照康德辨析,我们就可以理解作为思想史的现象,发现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知识更新都依赖于先验的观念更新,正是在观念更新意义上,思想自由形成分歧和冲突,从而展开了思想自由的空間。每一个新知识的发现,在观念意义上都有颠覆性、破坏性的效应。在当时当地,伟大思想家总是不被他所在时代和所在人群接纳,唯有时时间缓慢的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人们说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国家的落后和无知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观念的无知,而不是事实的无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解放思想从来都比改革开放,对观念的辨析和解释比真相重要。

康德的第三个观念就是观念的载体的张力是有限的,不可能达到对自在之物整全的认识。于是康德说,我发现必须否定知识才能和信仰保持一个地盘。康德这句话在我看来既不是完全否定知识的重要性,也不是倡导人们回到信仰的秩序状态,而是表现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就是已有知识体系在发现新知识过程中,不仅无助于新知识发现,而是新知识发现的阻挠。第二个判断是人类在发现新知识命题上必须要有观念层面的创新能力,必须具有对已有观念秩序破坏性创新能力,必须有异想天开的能力。而且康德认为:人类异想天开的能力只能来源于信仰习惯,必须承认人想象力是有限的。康德关于信仰和知识命题最好的见证是 17 世纪理性主义的浪潮,从笛卡尔开始大概有一百年时间。这段时间首先是理性主义,每个人都熟悉的一个定义。理性主义的定义基于第一性原理和先验秩序,而不是按照实验证据和逻辑推导知识,这个定义在理性主义高涨的 17 世纪是一个常识。这和我们今天理解的理性主义似乎不完全对称,今天人们谈起理性主义似乎是对人类经验的强调,是对人类作为思想主体整全思想能力的强调,这对 17 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对第一性强调处于悖反的状态。人类必须以认识上帝为终极使命,但是人类永远无法完全认识上帝,正是这种悖论式的观点秩序的表述,才促使思想家们开始关注演化秩序,所以达尔文出现了。达尔文搁置起点



和终点描述,专注于过程理性描述,达尔文的演化论是初期过程主义的理性主义或者理性主义的过程主义。必须强调的是演化论思想史价值非常重要。这在科学方法论层面属于范畴给定,或者给定的范畴。如果按照康德观念秩序描述,即使是达尔文的演化秩序也是被先验观念秩序引导的结果。

在如何理解一个观念秩序重要性命题上,亚当斯密是一个典范,他的国富论重要的话就是看不见的手,他的道德情操论主要的范式就是无偏差的旁观者。实际上都是对先验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观察,如果没有先验秩序的看不见的手和道德秩序的无偏差的旁观者,这一切都不可能。因此,和我们对道德情操秩序理解一样,我们多年以来都强调了,尤其是导向,效用主义导向,忽略了观念导向,特别是先验秩序观念导向。因此它不是坐标系本身,而是坐标系之后对一个或几个点的孤立想象。道德情操论很多人读不懂,我个人阅读体会是在思想、先验观念层面,在习惯层面一开始就不能理解斯密提出的无偏差旁观者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强调演化秩序的时候强调的是经验秩序。北大汪丁丁老师对道德情操论的无偏差旁观者的表述比较精到,在他的经济学思想史里面这样讲,我们每个人,每一个行为是否合意,依赖于假设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同时内化于我们心中的旁观者的评判。立足于我对观念秩序的辨析,我认为丁丁老师翻译完全是唯理论的表述,这样表述再次强调我在分析中国百年经济史的时候必须对秩序的观的信心和观念的方法。事实上丁丁老师还有一个表述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叙事方法表述,他的意思是中国人的叙事传统是历史叙事,而西方人叙事传统是科学叙事。丁丁老师提出这个观念来自于一个经济史学家讲的框架,在丁丁老师看来,中国传统历史叙事表现最能说服人的发言者并不是靠雄辩逻辑,只是给人讲一个故事,讲某某人是怎么生活的,其他人是怎么生活的,于是得到听众赞许,至于是否合乎理性通常不加以考虑。科学叙事首先是给定一个抽象的原则,就是跳出事实,进入一个抽象辨析框架,包括三个维度,第一是建构一个模型,第二是有一个类比,第三是有一个隐喻,构成经济学史的写作方法。但是中西关于叙事的分歧如此大,就让我们有一些问题要问,比如说为什么中国文明或者中国传统叙事缺少观念的预设,这意味着我们叙事传统缺少了对高于对象本身的形而上的整体想象力,是否意味着我们知识的分工秩序再没有进一步知识细分能力,是否意味着单向叙事能力压抑遮蔽了我们的科学叙事,是否意味着作为思想家的课题并没有承担起知识先知的角色,以至于所有个体都隐没在事实层面,从而缺少信心的追问和信心的条约,这些都有待于人们思考。

还有一个值得拿出来说的和观念有关的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宣称每个人在互相自愿贸易下能达到好的结果,说白了就是对主观偏好绝对尊重,所有人主观偏好都建立在个体主义观念基础上,就是必须尊重每个个体在市場层面上的主观偏好秩序,奥地利学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建构,在我的分析框架里面有一个框架就来自于奥地利学派。

花一点时间讲观念秩序给定,可能看似与我这三本书《百年经济史笔记》没有关系,但是非常有关系,决定了我的写法,也决定了我提出什么样的观念。

第二块就是《百年经济史笔记》的观念分析框架。它不是讲故事的文本,而是观念的文本,是写百年经济史之前搭建一个比较稳健的分析框架,建构起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史与当代经济学、模型,然后把百年经济史史料放在框架里辨析,最后得出一个旨在重新说明百年经济史的崭新观念系统,让读者依靠观念的冲击,而不是对史料的猎奇,真正在专业、理性和深度层面认识百年经济史的流变,进而理解我们今天经济生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毫无疑问,叫做百年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所以关于市场经济,关于一般秩序和

企业家理论的一般性的常识,是我百年经济史写作的起点,观念的起点。最有关系性的就是熊彼特的财富增长理论,因为这是企业家和企业家背后市场秩序为基本内容的课题,因此熊彼特框架就必须成为我的学术前提。我反复强调市场经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要是人组成的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必须遵循市场的逻辑,任何特色性的陈述,任何差异化的坚守都只能在市场逻辑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显得如此重要,熊彼特既有古典经济学的特色也有奥派的特色,所以熊彼特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框架之一。奥地利经济学的理论选择如此重要,按照熊彼特经济增长的创新的描述,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史和企业史双向叙事会发现令人惊讶的现象,百年以来中国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打开,人们就放弃了市场的方法,中国企业家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开始创新,就放弃了创新的方法。当然熊彼特的创新说很坚决,是一个纯经济学的概念,而不是技术的创造。所以这等于是知识和资源重新组合,而从事重组活动的只能是企业家,不是政府官员。无论是市场中的新产品或者老产品,加入了新元素,无论加入新生产和新贸易方式,开辟新市场,这些主体都是企业家。所以百年经济史和企业史双向叙事,这个方法的建构是我试图要强调一个观点,经济史和企业史逻辑发展是正相关的。

我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开放。说这个词就想到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我容纳了经济史和企业史双向叙事的开放秩序,开放理念是经济学理念,就是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全球化背景下比较优势理论,还有克鲁格曼全球贸易模型,把中国经济从 1820 年所有经济史放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是自由贸易,一是全球贸易过程,这样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开放模型里分析,再加上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在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下展开对中国百年经济史的分析。常态下开放性和企业家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对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观察,人们可以用企业家发展的数据和企业家案例进行量化分析,通过对一个市场经济基本特征诸多描述进行梳理,两种路径互为表里,促进我们找到经济社会发展、市场演绎和企业家变迁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三个时段,晚清就有一批企业家,盛宣怀、郑观应、胡雪岩、张謇。毛泽东当政以后,1950 年到 1978 年没有企业家,民国在早期有一批,荣毅仁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上海有太多企业家的名字。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发现王石、柳传志、马云。我的书里面量化分析不多,但是我知道陈志武老师一直在进行历史量化研究,对我有很大启示。

《百年经济史笔记》三个分析模型是方法论模型,就是杨小凯老师的分析框架预设。我把杨小凯教授的一段话念一下。他说一本历史著作都有显含或者隐含的理论框架,这些框架对历史各现象、变数的关系结构做一个假定,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框架,实证的研究就是在写史之前严明分析框架假设,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与史料之间关系,当分析框架足够多,且在不同框架中有充分竞争的时候,对于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

共识下脱颖而出。如果不言名潜在分析框架的假设,学者误认为没有一个理论框架,从客观的历史真相中,读者反而倾向相信一些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缺失对分析框架识别和分析能力,历史记录会变得非常主观。杨小凯老师所批评的历史叙事文本,就是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到的历史学教材,没有言明分析框架,小时候没有分辨能力,我们以为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历史。

按照杨小凯老师的分析框架预设,我的《百年经济史笔记》严格遵守自由经济学发展理念得出结论,但并不意味着我的写作成果具有排他性,也不以为其他的历史分析没有意义。在很多历史叙事中,我的经济分析史的文本只是其中之一,是多样性之一,是包容的也是可以借鉴的。

第三,是史料的来源。我没有在大陆教科书里找材料,很少的一点。为什么呢?我看到晚清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史料很多,但是主流的历史学教材弥漫着狭窄的路径依赖,市场上流行的通俗的戏说的历史文本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把大量的时间放在海外,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地的学者,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的文獻,我的书里以中国台湾为主,和企业史的文獻,拿过来的资料我认为对读者来讲是有新鲜感的。但是历史学研究层面没有新鲜感,我是观念的辨析,并不是历史真相的发掘。

后面是书里的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对中国经济后发秩序描述的再辨析。杨小凯和林毅夫有一个争论,小凯老师说后发劣势,林毅夫说先发优势。我的第一本书是《晚清启蒙课》,试图描述主流历史教材经济史叙事尝试,试图描述从 1820 年开始从全球蔓延的工业革命、新技术和全球贸易将晚清时代中国人逼进了市场经济时代,其中最醒目变量就是一大批优秀企业家的兴起。第二本书叫做《倒退的民国》,要解构民国情节,试图在经济史维度告诉读者民国乃是市场经济的倒退。在领袖经济意义上,中国百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几位政治领袖,在市场经济观念层面都处于严重无知的状态,正是这种政府主义和计划经济学,才是导致民国政府败走台湾的原因。第三卷是经济开放,原理是论领袖经济,在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搭建起来的分析框架之下,我看见当年的公私合营运动是对企业产权普遍的剥夺。当年毛泽东有一个经济和企业的大布局,甚至被米塞斯和哈耶克深入批判过——人造市场。经济学意义上,发生大跃进、大饥荒,甚至文革都是经济学的必然错误,因为经济学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中国人必须深入反思的经济史的闹剧。我这三本书我个人认为写得最勇敢的就是第三卷,没有任何遮蔽得分析了毛的经济学的面向,这在过去也是被一个禁区。为什么也许呢?因为这个书到今天为止并没有被禁止,卖得还不错,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从 80 年代开始是令人比较宽慰的经济史局面,一方面看到中国经济在慢慢展开,另一方面大量企业家普遍兴起,以至于企业家的风景已经超越晚清时代企业家的风景。周其仁老师应科斯邀请做了一个演讲,就是邓小平做对了什么?我们看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就是以观念秩序为基准的经济史分析文本。

进入我案例的介绍。第一个案例是对中国经济后发秩序描述的再辨析。我看大量资料发现,不是 1840 年而是 1820 年是中国近代化或者现代化的起点。一说近代史都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中国开始进入近代史,其实要早 20 年,20 年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成为一个强国就是三四十年的时间,中国改革开放到成为一个强国也是三十年,20 年如果发展顺当是很了不起的阶段。很多学者把 1820 年前后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开端,或者中国现代化和近代化开端,对于很多深居中国大陸的人,这样的观念非常陌生。由于受到主流历史教材影响,人们接收到的历史观点是明代后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1820 年以来的历史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很多知识人不认同这样的表述,有一个学者叫威廉伯恩斯坦,他有一本书叫《繁荣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值得深度辨析,他把 1820 年理解为人类经济增长分水岭,就是把这当做现代经济的起点。1820 年以前人们是普遍贫穷,1820 年之后出现革命性变化,人类财富急剧增长,用 200 年时间建立了

叹为观止的现代化财富。事实上伯恩斯坦这样的视角并不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经济史转型 1820-1992”,他认为历史上看日本人均受教育 GDP 增长 6%,人均寿命翻倍,国民受教育水平历史提高四倍,文盲人群迅速消失,都是发生在日本明治维新的人群之前大约 40 年时间,这个分析非常有意义。有一个很好学者郝延平,他有一本书是《中国近代商业的革命》,他的书与伯恩斯坦的观点是一样的。这本书得到刘广京悉心指导,而且史料采集方法就是刘老师教给他的,建议不要在中国找资料,而是到英国,找在中国做生意的洋行里面,找他们的财务报表。所以这本书所有资料都来自洋行的财务报表,往来收支。刘广京在中国台湾史学界是大拿式的人物,是老师的老师,先生的先生,非常有名。我有一本书是中国台湾拿过来的叫做《近代中国传统与蜕变》,这是刘广京老师 75 岁祝寿论文集,很多学者都是非常好的论文,第一篇就是余英时老师写的文章,这篇文章为什么有名呢?在 50 年代的时候有一场轰动整个华人学界的官司叫做笔墨关系,就是围绕毛泽东展开的。余先生提到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相当长的时间里面这个说法是为毛泽东做注释。因为毛泽东写一本书叫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他里面讲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已经萌芽着、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话,中国也将缓慢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毛的地位,他类似于圣旨式的历史表述,1949 年大陆主流历史学界都为毛泽东做注释。余英时当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从萌芽说肯定不成立。

认为胡绳说角度,余先生理直气壮认为 1820 年前后才是中国资本主义启蒙年代,而不是中国主流历史教科书写的那样。这样的学术梳理意义非同小可,意味着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现代化进程,或者中国对市场经济探索,对现代财富寻找,在时间上与整个人类社会是同步的。在繁荣的命脉上,中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的发达国家,今天之所以在市場层面相对滞后,原因不在于起点滞后,而在于过程的滞后,是在于发展过程中的中断和摇摆,一会儿搞几年,一会儿停下来,甚至倒退。这三本书也有摇摆的描述——1820 年到 1840 年是非常自由的 20 年,甚至包括货币的非国家化,完全开放的自由贸易。因为清朝的朝廷来不及管,而且对现代经济学比较陌生。但是 1840 年因为一个政治事件鸦片战争,林则徐烧鸦片,由一个政治事件带动对中国经济的破坏。1840 年之后中国签订很多条约,形成被动的条约口岸经济,在整个东南沿海都有一个条约口岸经济。条约口岸是被动的,是被外国人逼着签下来的合同。不像 1978 年以后邓小平主动把外国人的请进来,但是被动的条约口岸经济也是一种自由开放的经济,所以那个年代就兴起一个很著名的城市,就是今天的上海。整个东南沿海全部是在被动开放逻辑下展开的相对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晚清的价值,至少经济史这个意义是被我们遮蔽的。

由于晚清末年李鸿章这波人,看似开放,实际上走的是官督商办,是国有控制的经济,中国从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倒退到政府控制的大政府主义的经济,就是洋务运动。陈志武老师也有这个说法,说洋务运动完全是倒退的大政府主义的经济,计划经济的模式。我完全赞成陈老师的判断,晚清后期完整是计划经济。由于晚清谢幕,发生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高金喜老师说的中国式的光明革命。晚清的谢幕并没有像历朝历代那样大规模战乱,白吉儿夫人写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就是晚清谢幕没有破坏性;接下来大量民间力量兴起,包括企业家、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某些政府官员,这就出现所谓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并不仅仅是经济史黄金时代,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蔡元培这样的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影响力。但是这个时代很短,1927 年蒋介石清党成功以后,开始进行政府倡导的半计划经济的模式。蒋介石从 1927 年到 1949 年渐渐地从自由经济的局面走向有限的政府所谓的计划经济局面这样一个倒退。到 1950 年以后就不是倒退了,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毁灭性的变化。直到 1978 年后才开始有限的恢复,这就是所谓的过程的摇摆,或者过程的中断。

(下转 04 版)

—[上接 02 版]—

国务院参事夏斌:经济学家必须补课!

■ 萧三匝

萧三匝: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有哪几部分?如果让你对中国企业家群体说几句话,你最想说什么?

夏斌:基金会是一个公益组织,其资金来源全部来自于捐赠。因为基金会刚成立,对外活动还不多,很多企业和个人还不了解,因此目前捐赠的面还不宽,主要是一些机构和自然人。他们尽管是一些民营股份制企业和个人,但我认为他们有中国梦情

怀。之所以能有这个看法,因为捐赠的机构与个人尽管现在都不直接从事经济学研究与教育,但都学过经济学,有经济学知识,搞经济工作,懂这件事对中国来说是件大好事,所以愿意支持。现在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较麻烦,他们也都知道这件事办得好,但捐赠很难办。

对企业家群体我想说,第一句话,经济学基金会是鼓励理论创新,企业家是关心企业成长,坦率说,两者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企业家而言,可能关心的是应用研究、宏观对策

研究,这些对企业发展有宏观指导意义。第二句话,但是基础理论研究与创新,是对策研究的基础,缺不得。而当今浮躁的中国社会恰恰缺的就是这些。因此中国要崛起,这些都要追赶、要补课。第三句话,“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来资助办中国社会应该办的事,不管出钱多少,都在无形中默默推动了中国公民社会公益心的培养与扩散,是在“积德”。希望有更多怀揣有“中国梦”情怀的企业家,来关注与支持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大业。

(本文刊发于《中国企业家》杂志)(完)